

# 多模态话语中符号意义构成研究\*

张德禄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提 要** 本文致力于对多模态话语中符号意义的构成进行研究,首先探讨了基于供用特征、话语实践和符号世界三个视角的符号意义的研究,以及从符号世界四个层次的现象域对符号意义及其来源的研究;然后探讨了符号意义、符号系统的生成及其过程;接着,探讨了符号不同意义特征的功能;最后讨论了不同类型的符号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不同作用。本研究发现:1)对符号的供用特征进行研究,应该主要探讨符号的实体是如何符号化成为“意义潜势”的;2)任何符号,无论它派生于哪个层次的符号世界的现象域,其意义都是符号意义,但派生于不同层次的意义具有不同的特征;3)符号的意义一般通过:①给物体赋义,②使符义延伸,③符号借代,④符号创新等四种方式生成;4)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包括通过从上到下,从意义到实体的选择过程和从下到上的符号识别和规约化过程;5)派生于不同符号世界现象域的符号可在多模态话语模态配置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本研究将会对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符号的选择以及认识每个符号的意义特征具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 多模态话语 符号意义 供用特征 符号系统 意义潜势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23.03.011

## 一、引 言

多模态话语研究从其诞生之日起(O'Toole 1994/2011:1-31; Kress & van Leeuwen 1996/2020:17)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多模态话语的建构既涉及由不同模态(mode, modality)或不同类型的符号(types of sign or semiotic systems)体现,也涉及由物质材料(physical materials)和媒介(medium)体现。也就是说,多模态话语建构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符号,所选符号的意义不仅由符号的形式体现,同时也由符号的物质材料和媒介体现。这就需探讨所选符号或符号组合在体现整体话语中具有什么意义特征,它们如何相互协同和配合,以及它们如何在符号系统中生存。这几个方面都涉

---

\* 本研究为国家哲学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多模态话语建构中模态配置的机制和机理研究”(项目编号:22BYY002)的阶段性成果。

及对符号的供用特征(affordances)的研究,也涉及对符号不同层次的特征对模态整体意义的贡献研究。

## 二、符号意义构成研究

首先,一个符号或模态所携带的意义就是它特定的潜在意义,或称“意义潜势”,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语境,并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不同的结果。“一旦确定某个物理活动或者某个物体是一个符号资源,我们就可以描述它的符号潜势,即它创造意义的潜势”(van Leeuwen 2005: 5)。符号的这种意义潜势首先是由心理学家吉普逊(Gibson 1979/2015: 94)提出来的,指“某个物体的潜在用途”称为“供用特征”(affordances)。实际上,吉普逊用“供用特征”这个概念来探讨任何物体,包括环境、动物、人等的用途、功能、价值,如斧头的供用特征是可用它砍断东西。见到斧头,就好像它在说,“快用我砍东西”。但它的价值是相对固定的,不会受情感、态度、观点等的影响。这样,斧头的供用特征就确定为“砍东西用的工具”。一个物体的供用特征是由它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吉普逊是从生态物理学的角度定义供用特征的,所以这个定义突出了符号的实用意义和价值。

供用特征与韩礼德(Halliday)的意义潜势相似,指语言的能指——词和句子——具有指称潜势,而不是实际意义,需要在社会语境的交际实践中来实现。但吉普逊的供用特征的问题是:它聚焦研究物体的所有价值、功能、意义,但却没有把它符号化,所以,它没有一个代表这个符号的整体意义。例如,在物体由图像或文字表现时,就不清楚应该如何描述它们的供用特征。例如,斧头的供用特征是“砍断任何物体”,但“斧头”还可以作为一个符号来代表“劳动人民”,表示“勤劳”“粗犷”“豪迈”等,例如,惠特曼(Walt Whitman)在其《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中对斧头的描述,而实物“斧头”却没有这些延伸或隐喻化的意义。另外,“意义潜势”主要指已经引入社会交际中的意义,而供用特征还包括潜存于物体中,没有被发现的,有待于将来去发现的意义(van Leeuwen 2005: 5)。据此,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性,我们需要继续探讨某个媒介在社会化、符号化以后,它的供用特征到底包括哪些意义;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继续探讨物质材料和媒介所携带的意义。

语言学家认为,意义是通过词汇、语法体现的,更低层次的媒介和实体特征不直接体现意义;因此,就有了语言的“双层组构性”(double articulation)(Lyons 1977: 71-72)或任意性特征(Saussure 1959: 67)。但克雷斯和凡·莱文(Kress & van Leeuwen 2001: 111)认为,交际实践可以在多个层次上进行,不仅可以进行话语实践,还可以进行设计实践、生产实践和分布实践。每个这样的层次都可以对意义构建做出贡献。话语实践指构建话语意义的过程;设计实践是通过模态选择的设计来体现意义的过程;生产实践是组织表达的过程,即通过媒介实现表达的过程;分布实践是使交际实践现实化的过程,涉及话语的传播和记录等(张德禄 2012)。在任何非语言模态中,所有体现意义的符号及其组合也都可以对话语意义构建做出贡献。在任何文化中,当某个物质资源被引入交际过程中时,它就成为该文化的符号资源,成为构建意义的符号。根据他们(Kress & van Leeuwen 2001: 111)的观点,在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中,不仅要探讨模态符号的词汇、语法如何体现意义,还要看符号的媒介、物质材料如何对意义构建做出贡献。然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符号不同层次的特征如何作用于话语整体意义。

麦提逊和喀什亚普(Matthiessen & Kashyap 2014)在研究如何表现空间时提出,空间可以通过四个层次的现象域(phenomenal realms)表现出来:1)物理系统,即自然界及其万物;2)生物系统,即物理系统+生命,指具有自我再生、个体性,可通过基因记忆进化的物体;3)社会系统,即物理系统+生命+价值,指能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扮演一定角色,根据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社会分工的生物;4)符号系统,即物理系统+生命+价值+意义,指能在社会交际中扮演话语角色的意义表达者,能创造和交流意义。空间本身是物理系统的实体成分,在生命系统中能通过感觉系统经历和感知,并进入生物的神经系统中,指导生物在空间中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空间被赋予价值,转换为社会结构成分,如近距离表示亲密等。在符号系统中,空间被赋予意义,交际者的空间经历可以转换为可交流的空间模式,并可延伸到其他领域。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由图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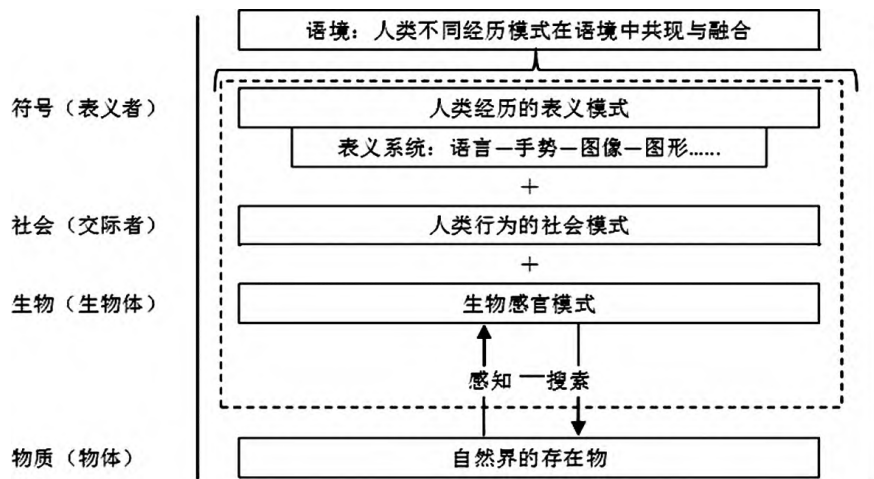


图1 符号世界四个层次的现象域之间的关系(根据 Matthiessen & Kashyap 2014 改编)

通过图1可见,物体的符号化过程开始于生物层,从被生物体感知和认识开始;被感知后才能被社会化,被社会化后才能被符号化,被赋予意义。某个媒介只有上升到符号层,成为符号系统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常规性地用于表达意义。所以,任何符号的意义都存在于符号层,但这并不是说物质材料、感知和社会价值不能对话语的意义构建做出贡献,而是符号意义本身就包括由社会、感知和物质特性携带的意义。它们的这种关系可以由图2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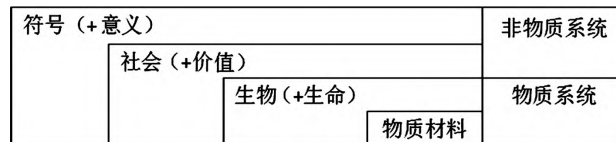


图2 符号的四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根据 Matthiessen & Kashyap 2014 改编)

从图2可见,在符号这四个层次的系统中,物质材料和生物系统是物质系统,而社会系统和符号系统是非物质系统。物质材料和生物系统都是自然界产生的,是客观存在的,不依赖人的认知和识别而存在,具有物质特性。但如果它们要让人认识,被赋予价值和意义,就需要人类通过社会交际来使其符号化。

综上所述,吉普逊主要从物质材料所表现出来的用途(包括潜在用途)来探讨物体的“供用特征”,它包括了现有的供用特征和潜在的供用特征,但没有探讨它符号化的特性。克雷斯和凡·莱文主张从话语到设计、生产、分布多个层面来确定符号的供用特征,即从符号、媒介、物质材料等多个层面来确定符号的意义(供用特征),这样会使话语意义的选择复杂化,同时,也忽视了高层次特性之间的关系包含低层次特性之间的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麦提逊和喀什亚普从符号演化的角度区分物质材料、生物、社会和符号四个层次,探讨了符号在话语生成中的意义模式,以及四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并且表明了在这四个层次中,高层次特性之间的关系包含低层次特性之间的关系,这就间接表明了符号的意义包括所有四个层次的特性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将麦提逊和喀什亚普提出的符号的四个层次现象域模式,克雷斯和凡·莱文提出的话语生成的四个层次的实践过程模式,和吉普逊的供用特征概念结合为一体,用以探讨符号的生成模式、过程以及符号系统的生成。

### 三、符号及其系统的生成

#### 3.1 符号生成模式

在生命产生之前,原本世界没有符号:世界万物都是在自然界自主存在的。但后来,生物产生了,并不断进化和发展。它们学会了通过创造符号来进行社会交际。不仅人类,所有生命体都可以对环境做出反应,从而使自己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因此,就产生了符号。例如,诺斯(Nöth 1994: 3-4)认为,“生物体对环境刺激的新陈代谢反应是有目标的行动。生命体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选择和评估环境提供的能量和物体,同时,认为其他环境刺激不合适,拒绝其他环境刺激”。这是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即生物系统的符号科学(Kull 1999: 386)的研究对象。我们这里聚焦于人类对符号学的研究。人类发展了“符号发生学”(semiosis),简单地讲是“生成符号和意义”(Innis 1985: 247),更具体地讲,是“符号( $v$ )在一定语境( $z$ )中,以一定的方式( $x$ )在释者( $w$ )中生成对某个所指物体( $y$ )的意指”(Innis 1985: 176)。这个更详细定义一方面指出了符号生成的核心是“生成对某个所指物的意指”,另一方面还提出了语境、方式、释者的作用。下面我们主要探讨如何“生成对某个所指物的意指”。

如前所述,符号的意义来自四个层次的现象域:物质材料、生物、社会和符号(Matthiessen & Kashyap 2014),但它们一旦符号化,就都属于符号范畴;也就是说,无论它们本身的意义是从哪个层次发展而来,最终它们都是符号,具有符号的一切特征,但不同来源的符号会突出不同的意义特征。关于这一方面,下面还要专门讨论在符号的不同世界中,符号生成的模式是什么。

首先,在物质材料世界中,物质材料是在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变化而变化。在这种环境中,符号是不存在的。根据西比奥克(Sebeok 1986: 15),在宇宙大爆炸发生之后,世界上只有信息,没有符号。信息的核心是变化,而符号发生的前提条件是生命(Nöth 1994: 3)。符号发生是区分生物和非生物的关键因素。据此,物质材料需要经过生物的认识和解释,被赋予意义,才能成为符号。在这个层次上,符号主要起标示物质材料特性的作用,如它是什么,表示什么特征等。例如,一种十分坚硬的物体被人类识别为一种矿物体,称为“石头”。再如,颜

色有许多类型,每一种颜色符号都有它作为物理的颜色类型成员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其他符号,但又与其他符号密切相关的意义,如互补、对立等。例如,红色首先具有物质特性,是一种颜色,与橙色、紫色、黄色等相互对立、相互补充。

其次,生物本身,如树、虫、鸟、动物,其特性及运动形式也是在自然界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变化而变化的。由它们产生的符号也主要起标示某个生物特性的作用。这两者从这个角度讲都是产生符号意义的资源。这确立了它第一层次的意义(来源于自然界存在的物质系统的意义)(见图3)。

然而,生物除了是物质外,还具有生命,有其独特属性,如应激性、记忆性、遗传性、进化性等。正是这种特性使符号的产生成为可能。例如,可以通过红色对感官的刺激而使其产生新的意义,如鲜艳、醒目等。不同类型的生物将物质系统符号化的可能性也不同。植物没有意识、不能运动,但有应激性,尽管它很弱,所以仍能生成符号。研究植物产生的符号的科学称为“植物符号学”(phytosemiotics)。而某些动物,如鸟类、鱼类、爬行动物类、两栖动物类,它们的社会性基本是遗传和固定的,处于初级符号的层次,即物质体和意义一一对应的符号,如鸟的叫声等。而另外一些动物,如大型哺乳类动物和某些特殊的动物,如蜜蜂,在符号使用上创造性更强,特别是灵长类动物等。研究动物系统符号的科学称为“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这样,通过生物可产生第二层次意义,即对现象的反应、反馈所产生的意义(见图3)。

再次,生物体之间,特别是人类之间还需要进行相互交流,组成社会,共同生存、生活和发展。这时,仅仅物质材料所具有的本体意义,以及由感知获得的意义就不够了,因为它们只涉及个体的反应和活动。它们还需要发展更加抽象的符号意义来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

社会交流也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例如:最原始的交流是“物—物交流”;其次,是行为交流,包括通过行为进行的行动、情感等的交流;另外,在更加抽象的层次上,是“话语交流”;最后,交流还可以在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如建立各种组织、团体等。社会组织具有大小、松散、紧密、自发、规约化等之分,都对符号的产生起作用。另外,还可以跨越层次,在不同层次之间进行交流,例如,“话—物交流”等。这样,通过社会交流可产生第三层次意义。

据此,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交际活动;所有的交际活动,都涉及交际者、交际行为和交流物,也都涉及交流意义;因为,不理解交流的意义,就不会有交流(见图3)。

最后,所有的社会交流,都涉及符号交流,即把物质材料、生物、社会交流的活动、行为、事物等都转化为常规化、规约化、习惯化的符号:一个具有能指和所指两个层次的符号,也就是说,它们都要进行“符号化”(semiotization 或 semiosis)(Nöth 1994: 1)成为符号(见图3)。

第1层次	物体→意指		
第2层次		生物→应激	
第3层次			社会→交际
第4层次			符号→抽象喻化

图3 四个层次符号意义的生成

这样,在第四个层次上,所有的可识别和辨认的物质材料、事物、生物、行为、社会交流活动等都被赋予比较稳定的意义,使它们转换为符号。这个过程基本上可通过以下四个步骤实现:

- 1) 给物体赋义, 2) 符义延伸, 3) 符号借代, 4) 符号创造。

1) 给物体赋义: 给物体赋义就是把事物转换为“意义体”(semantic entity)。给事物命名, 是符号化的基本方式。例如, 颜色被识别和辨认, 总体上把这种事物命名为“颜色”。然而, 颜色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 需要给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命名, 所以, 就有了给主颜色(黑、白、红、黄、绿、青、蓝、紫)和次级颜色的命名。虽然颜色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而是形成一个连续体, 但人类为了能够表示它们之间的差异, 而人为地把它们分为不同的类别, 并且命名。除了物质材料和生物外, 需要命名的还包括社会产物, 如社会组织、参与者等; 社会活动、行为也在被物化后以事物的形式被命名(名物化过程); 表示事物的变化过程, 如行为、动作、运动、变化等, 如颜色由黑色转化为红色, 还包括心理活动: 观察、感知、反应、认知、愿望等; 表示事物的特性和属性, 如颜色的鲜艳、暗淡等; 最后需要命名的还包括表示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存在, 如“黑色是颜色”“灰色是黑白混合色”等。

2) 符义延伸: 由于社会交际的需要, 人类需要进行交流的意义不断扩展, 从而产生越来越多的要交流的意义。因此, 某些事物的属性和特性被赋予新的意义, 从而产生了符号的延伸意义。这种延伸意义可成为新符号。例如, 红色是物质材料呈现给生物的外部表象, 但在社会交流中, 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政治和情感意义, 如革命、胜利、热情、喜庆、喜事等; 在西方文化中被赋予不同的政治或情感意义, 如暴力、战争、下降、取消、停止等意义。例如, 红色似火可延伸得出“热烈”的情感联想意义, 而红色似血可产生“危险”的联想意义。联想意义这个由生命感官产生的意义还可以向文化领域扩展, 在一个文化中产生的联想意义, 如“热烈”, 在另一个文化中则可能不存在。由此可见, 在这个层次上, 符号意义之间的互补性、对立性降低, 即在某个符号中存在的意义, 在另一个相关符号中可能找不到相对立和互补的意义。例如, 红色表示热烈, 而蓝色并不表示平静, 或冰冷等。

3) 符号借代: 符号还可以被借用, 赋予新的意义, 组成新的符号系统。例如, 交通信号没有自己的物质材料符号或生物体符号, 但它能够借用颜色通过光线实现符号化, 把绿色转化为“通行”, 橙色转化为“准备通行或停止”, 红色转化为“停止”, 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信号系统。

4) 符号创新: 随着意义系统的扩展, 不断需要新的符号及其系统的诞生和发展。除了依赖把物质材料和生物体媒介化、符号化之外, 还可以创造新的符号及其符号系统来表达新的意义, 包括已有符号的再符号化(resemiotization), 例如本来玫瑰表示一种植物, 通过意义延伸可表示美丽, 但它还可以再符号化表示“爱情”。语言本身就是人类创造出的新的符号系统。在创造新符号过程中, 还会出现符号生成的逆生过程, 即首先产生意义或意义系统, 然后创造适用的媒介, 如口头发声、书写符号等(详见图4)。

### 3.2 符号生成过程

如上所述, 符号的生成和存在依赖于符号世界四个层次的现象域的共存, 分别是物质材料、生物、社会和符号(Matthiessen & Kashyap 2014)。其中, 物质材料和生物是物质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 而社会和符号是非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符号世界四个层次的现象域都对符号的生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符号本体是一个潜在的意义体, 因此是非物质的。说它是潜在的是因为它在话语中体现的意义都是语境赋予它的, 也就是说, 是语境促动交际者表达这些意义, 从而选择合适的符号或符号组合来体现它。而符号具有这些潜在意义正是因为它在不

断地体现语境所赋予的相同或相似意义,从而形成规约化、稳定的语境特征和符号的规约化关系。

然而,为什么语境要赋予符号这些意义?这是因为语境赋予符号这些意义都是在社会交际过程中进行的,社会交际涉及意义交换,所以,就需要运用符号体现意义来进行社会交际,通过选择和配置模态来体现话语意义。例如,当交通信号中的绿灯亮时,行人就通过斑马线走过马路,就完成了一次交通交际过程。在此,“绿灯”和“行人过马路的行动”都成为交通意义系统的符号。据此,符号能够生成和存在都是由社会交际促动的,也就是说,是因为它在人类的各种社会交际中有一定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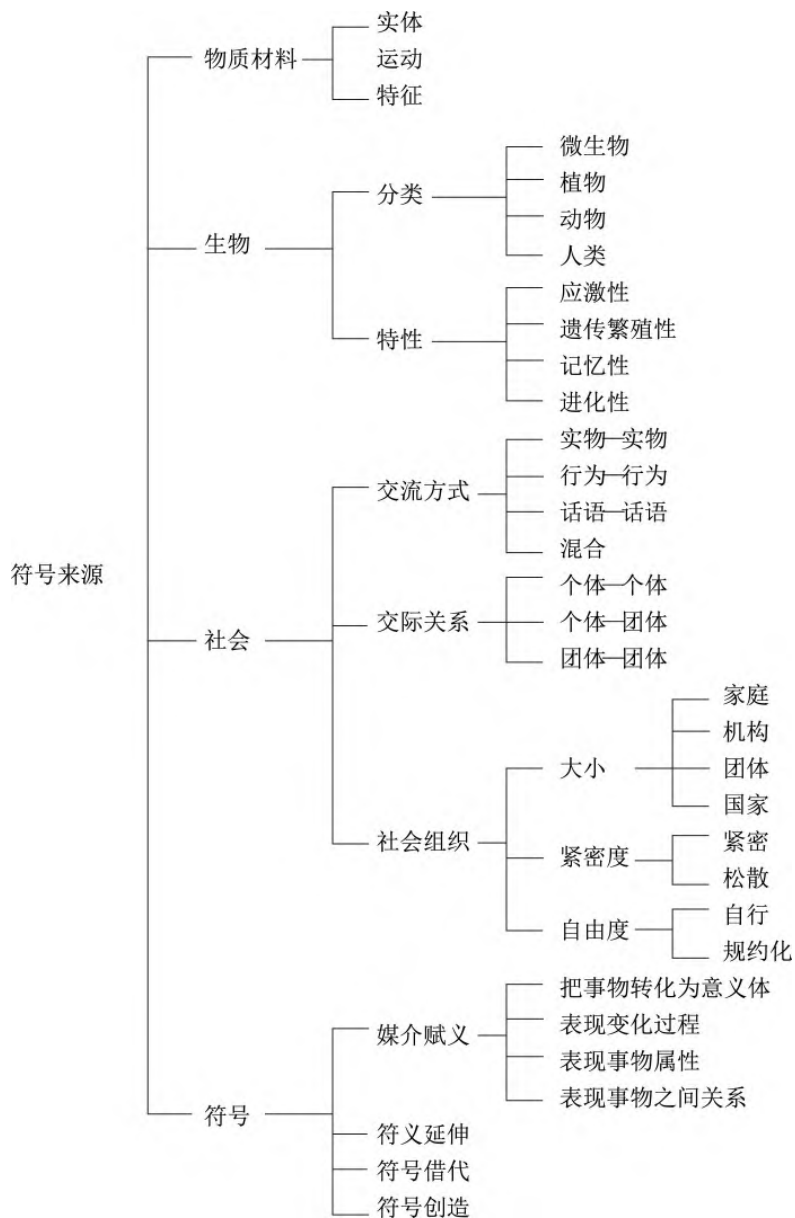


图4 符号产生的资源

符号是以它能够具有潜在的意义,在社会交际中得到应用而生成和存在的。同时,社会是因为个体间,特别是人类个体间存在一定的交际关系而生成和存在的。两者都不是物质的,因此,都需要通过物质世界的实体转化为媒介来体现,也就是说,符号要通过物质材料和生物作为媒介来体现自己,来生产由符号或符号组合体现的话语。

物质世界包括物质材料和生物体。生物体是在物质材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社会和符号都依赖于生物来感知、识别、构建。符号及其潜在意义在所有四个符号世界的现象域内的感知、识别和构建都依赖于生物体。首先,只有生物体,特别是人类,才具有感知、记忆、识别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同时,也只有生物体,才具有使用符号的能力。而高级符号系统,如语言等,则只有人类才能真正使用。

符号的最终载体是物质材料或生物体,两者实际上都是“物质世界”的成分。而物质材料和生物体能够成为符号的载体也是由生物体所具有的应激性、遗传性、进化性、推理性等特性决定的。例如,宝石是和其他矿物一样的物质材料,但生物能够感知它的某些特性,如坚硬、透明、绚丽、光滑、光亮等,同时也可以对其做出反应:如喜欢,可用以玩耍等。而人类作为更高级的生物还可以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如因为它坚硬而作为特殊材料用;因为大家都喜爱它而把它作为收藏品或交换品,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因为它珍贵又可以把它作为贵重物或品质的象征,如把孩子比作宝石等。符号及其系统的衍生和进化过程可以由图5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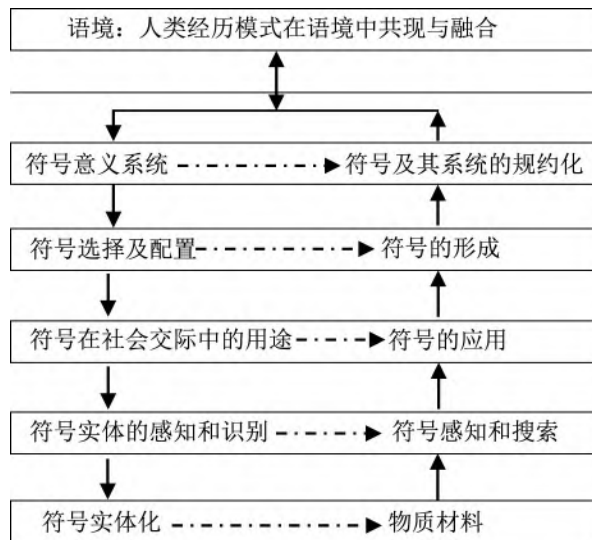


图5 符号的生成与进化(根据 Matthiessen & Kashyap 2014 改编)

在图5中,符号在社会交际中起作用需要经过从上到下的过程。受语境因素的促动,交际者需要到符号系统中选择合适的符号,然后使它们相互配置协同,在社会交际中体现意义,而这个符号也就被使用者感知和识别为一个媒介成分,由一个实体承载。而符号的生成和进化需要通过从下到上的过程。首先,物质材料要通过生物体感知和识别才有可能成为符号的载体。而这些被感知和识别的物质材料,可以在社会交际中有一定功能,成为潜在符号。这个潜在符号如果在社会交际中被设计者赋予意义,就成为一个实际符号,成为能够直接体现意义的事物。如果这个符号在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中被经常符号化,就会成为规约化的符号,并和其相



关的符号形成新的符号系统,那么它就正式成为人类在社会交际中认可的符号,并和其他相关符号一起形成符号系统。

### 3.3 符号系统的生成

单个符号在社会文化和社会交际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能和其他相关符号共同组成符号系统,共同体现一个“意义域”(semantic domain),从而相互共生共衍、互补互对,在共同发展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潜势”,即符号系统。

例如,颜色在几乎所有文化中,都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尽管在不同的文化中,所发展的符号系统是有区别的。颜色是光作用于人的眼睛引起的除形象以外的视觉特性,因此,它是物质特性被生物感知后的特性。颜色系统包括颜色的类别及次类别在意义上的对比性和互补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一种颜色,如黑、白、红、黄、青、蓝、紫,以及它们的次类别,如灰、微黑、深黑等,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选项。

某个系统内的符号还可能被借用,从而产生新的符号系统。例如,交通信号系统并没有自己的物质材料和生物体系统来作为符号产生的实体,但它借用了颜色系统的符号,从而形成了新的符号系统,即交通信号系统,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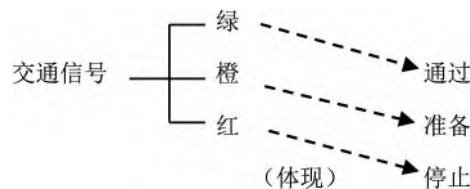


图6 交通信号系统

总的来说,符号只有系统化,成为某个符号系统的成员,才能在社会交际中被接受,成为规约化的符号。所以,世界上的符号都是以符号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一定的语境中,某些符号系统被激活,被选择成为社会交际的话语。所谓“文化”,确切地说,是由无数的符号系统组成的意义潜势。

## 四、符号不同意义特征的功能

符号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功能。在符号用以表现客观世界的事物,即符号的意义主要派生于符号的物质材料特征时,它主要涉及表现事物的基本表象和特点。符号学中的一个分支是“自然符号学”(natural semiotics) (Sebeok 2000: 9),用以释解主体和世界的关系 (Quinn 2001),是主体,如人,赋予实体意义,使它成为符号的载体。这类符号在对事物的客观描述和叙述的话语以及科技话语中十分突出。当然,生物体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也可以生成这类符号,包括菌类、植物、动物等。

在符号意义主要派生于生物体,如表现情感、反应、感觉等时,它不仅表现物质材料的特性,还同时可以表现态度、情感意义。例如,在描述生物,特别是人的行为、行动、语言等时,人的意向、态度、反应、感觉、情感就会同时表现出来。这类符号主要出现在有关生物体,特别是

人和动物的行为、反应等中,如叙事类事件和活动,仪式、庆祝活动。

在符号意义主要派生于社会,包括社会交际、社会结构等时,它除了表现实体、生物体特征外,还表现生物体,特别是人类的社会交际特征。人类在其一生中的生存、生活、工作和发展中,需要不断进行社会交际活动,包括某交际者突然进入某个语境中,并出现了新的交际对象,提出让你提供信息,如指路或者提供物品或服务。你需要迅速做出反应,可以用语言,也可以用非语言符号。其实,每一种情况都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每一种选择都形成一个话语,由语言、行为动作、面部表情、身体距离、口气腔调等不同模态融合体现。

最后一种符号其意义是由人类创造的,如人类的语言。这类符号不是自然界天生的,它们的媒介是在自然界产生的物质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改造创新发展出来的。例如,人类具有发声器官。人类为了表达利用自然媒介无法表达的意义而逐步发展了口语,利用口头发声来表达意义。除此之外,还有书面语、盲语、密码语、抽象的图形、图像等。另外,人类还能够借用已有的自然界的物质材料来生成新符号,给原有的符号赋予新的意义。例如,红色服装是一种衣服,具有鲜艳的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给它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结婚礼服”,成为一个新的符号。在这个层次上产生的符号是人类专用的符号,具有特殊的文化特点,主要用于社会文化交流中。这类话语的意义具有社会文化性。

## 五、实例分析

下面笔者选取一幅虚拟的生日聚会图片<sup>①</sup>,以其所表现的实际交际事件为例来说明符号世界不同层次的现象域之间的关系。首先,从语境层次看,“过生日”成为人类文化中规约化的一个针对个人的节日。在这一天,过生日者要邀请他/她的亲朋好友搞一个聚会,大小不等。聚会上的主要项目是祝贺者要给过生日者送礼物,口头祝贺他/她生日快乐,大家分享蛋糕以及会餐等项目。虽然不同文化间在过生日的具体细节上有区别,如礼物的类型、祝贺程序等,但从活动的基本程序上看,大体上是一致的。从情景语境的角度看,语场是生日聚会活动;语旨是过生日者与祝贺者相互关系密切;语式:面对面现场交际,包括口语、手势、身体动作、生日所需物品等;体裁(genre):生日聚会。



图7 生日聚会

这就决定了这个生日聚会的话语意义模式是体现生日聚会的体裁结构模式,包括“入场^送礼物^宣布生日聚会开始^祝贺词^许愿^吹蜡烛^吃蛋糕^聚餐^结束”等环节。这个程序可以根据人数的多少、相互关系的类别(如同事间、同学间、朋友间等)而有区别,但大体是一致的。从本图提供的信息来看,现在还处在入场、送礼物阶段。

从物质材料的层面看,为过生日准备的有礼品、蛋糕、气球、彩旗以及环境中的事物,如桌子、墙壁等。

从生物体层面看,所有生命体都是聚会参与者。参与者中有戴“皇冠”的过生日者和戴“小尖帽”的祝贺者。从感知的角度看,作为生命体的参与者需要从物质材料(包括他们自己)中感知到价值和意义,使它们上升到符号层面。通过视觉可以感知到礼品的包装五颜六色、捆绑有序,期待里面包装的是对于过生日有意义和价值的礼品,气球、彩旗、墙壁以及每个人头上戴的小尖帽、每个参与者脸上的笑容都呈现祥和、欢乐、幸福的气氛;通过听觉可以感知到大家都谈笑风生,幽默风趣(虽然语言没有在这个图片上显示出来);通过嗅觉和味觉,蛋糕扑鼻的香味和诱人的味道也使大家十分期待。不同的感知通道相互协同合作,为出现的物质材料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例如,蛋糕的味道只能通过嗅觉和味觉感知,而五颜六色的礼品和装饰物只能通过视觉感知。

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是由生命体组成的。生命体,特别是人类之间,需要形成社会团体才能更好地生存、进化和发展,据此,相互之间需要相互帮助、合作和交流。生日聚会也是一个社会合作和交流形式。人们每到自己的生日就要举行一次仪式,表示自己又长了一岁,认为值得庆贺。而其他参与者作为他/她的朋友和亲人都来帮助他/她实现这个心愿,而且这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仪式,从而可以使人类社会形成更加密切的合作和交流形式。这种社会交流形式的形成也要依赖于所提供的物质材料,因物质材料是他们形成社会形式的工具或条件。例如,在庆生活动中,送礼品、戴皇冠和尖帽(可选项目)、准备蛋糕等都是需要的。而且,蛋糕的味道、营养和色彩也是很重要的物质条件。

最后,与本活动相关联的物质材料、生命体和社会产品都需要符号化才能真正参与到社会交际或话语构建中。实际上,它们基本都是已经符号化的事物,在情景语境中它们被重新选择来构建多模态话语。在物质材料方面,礼品及其包装形式、预计里面包装的东西、桌子、气球、相机、蛋糕(包括其味道和营养价值)、皇冠和小尖帽、彩旗、地板和墙壁都是大家熟知的,被赋予意义的事物。而五个参与者作为生命体也被符号化为人,更具体地讲,年轻人或小学生。从社会层面看,戴皇冠的过生日者和戴小尖帽的祝贺者形成了祝贺和被祝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符号化的社会关系。在符号层,除了这些来自于物质材料、生物体和社会层面的符号外,还有的符号具有纯符号的特征。例如,小尖帽和皇冠都是纸做的,它们的实用价值极低,但它们可以区分过生日者和祝贺者;礼品不是直接送来,而是要包装好,也就有纯符号特性,标示它们是礼品,不是一般的物体。最后,没有出现在图片中的参与者之间的话语也是纯符号性的,因它们的载体,声音除了标示符号外,没有其他功能。

这样,来自于不同层次的现象域的符号相互协同、相互配置、相互补充,各自填补了交际事件所需要的不同的意义特征,包括物质性的(颜色、味道、实用性)、生物性的(可感知)、社会性的(可组织)和纯符号性的(意义标示),使整个交际事件成功进行。

## 六、讨 论

本文致力于探讨符号意义的构成模式,意在说明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不同符号系统中的符号来构建语篇,同时探讨不同类型的符号在话语建构中的不同作用。首先,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话语的意义具有多样性,会涉及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意义,因此需要选择承载这些不同类型意义的不同类型的符号。例如,在日常生活话语中,参与者所处的环境会涉及不同类型的物质材料及其运动形式,交际者对这些事物的认知和识别会涉及第一层次意义。其次,对这些事物表现出不同的反应,给予不同的反馈,如表情、行为等,会涉及第二层次意义。第三,交际者之间物与物以及行为、行动之间的交流会涉及第三层次意义。第四,他们会进行语言及其他纯符号类交流,特别是在交换信息、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等的交流中。这类符号体现的意义是第四层次的意义。

以上涉及的不同类型的意义会在同一个话语中出现,如在日常生活话语中,那么,这段多模态话语就是由从四个层次的现象域的符号系统中选择的符号相互配置、协同而成的。但这并不是说,体现不同层次意义的符号在多模态话语中都是起相同的作用。在多模态话语中,每个模态在整个话语建构中的作用都是不同的。例如,在面对面的对话中,一般来讲,口语模式是主模态,承担体现话语整体意义的核心部分,而手势、面部表情等只起辅助作用;身势、体距、空间布局补充口语模态体现的意义。

## 七、结 语

综上所述,多模态话语是通过从不同的符号系统中选择合适的符号,并使它们相互协同融合而生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符号都具有不同的供用特征,是体现某种特定意义的潜势,据此,探讨符号的供用特征成为多模态话语分析和符号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符号是在符号系统中存在和被选择的,而符号的生成来自于符号世界四个层次的现象域:物质材料层、生物层、社会层和符号层。符号生成的来源也决定了每个符号的特定的意义潜势,以及它们在实现多模态话语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和相互配置关系。本研究对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符号的选择以及认识每个符号的意义特征分析具有一定启示。

### 注 释

① 语料来源: <https://img-qn.51miz.com/preview/element/00/01/20/65/E-4206555-8F07ABC5.jpg>

### 参考文献

张德禄 2012 论多模态话语设计,《山东外语教学》第1期。

Gibson, J. J. 1979/2015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Republished by Psychology Press (New York & London), 2015.

Innis, R. E. 1985 *Semiotics: 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Advances in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Kress, G. & Leeuwen, T. van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Arnold.

- Kress , G. & Leeuwen , T. van 1996/2020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Routledge , London and New York.
- Kull , K. 1999 Biosemio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view from biology. *Semiotica* ,127 ( 1/4) 385-414.
- Lyons J.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tthiessen , C. M. I. M. & Kashyap , A. K. 2014 The construal of space in different registers: an exploratory study. *Language Sciences* ,45 ,1-17.
- Nöth , W. 1994 *The Origin of Semiotics: Sign Evolution on Nature and Culture*. Berlin: Mouton de Gruyer.
- O'Toole , M. 1994/2011 *The Language of Displayed Art*.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 Quinn , A. W. 2001 On some philosophical dynamic and connectionist implications of the canonical formula of myth seen as space categorization. In P. Marandat. *The Double Twist: From ethnography to morphodynamic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22-266.
- Saussure , F. de. 1959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 Sebeok , T. A. 1986 *I Think I Am a Verb*. New York: Plenum.
- Sebeok , T. A. 2000 *Essays in Semiotics-II: Cultural Signs*. New York: Legas.
- van Leeuwen , T. 2005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London: Routledge.

## Research on the Sign-Meaning Formation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Zhang Delu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sign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Firstly , it surveys the studies on the meaning of the sign and its origin in the field of semio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ffordances , discourse practice and the theory of the four levels of the phenomenal domains in the world of semiotics. Then it studies the gene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sign and its semiotic system. Thirdly , it investigates the function of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sign. Finally , it discusses the rol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ig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 as well as the synergy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It is found that: 1) The affordances of the sign should b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w the material entity of the sign is semiotized and becomes “meaning potential”; 2) Any sign , no matter from what level of the phenomenal domains in the world of semiotics it is derived , its meaning is semiotic in nature , only that the meanings derived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phenomenal domains in the world of semiotic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3) The meaning of the sign is generated by ways of: ①attributing meaning to objects , ②extending the semantic domain of the sign , ③semiotic borrowing , and ④creating new signs; 4)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sign includes the choice proceeding from top to bottom , i. e. , from meaning to entity ,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conventionalization of the sign proceeding from bottom to top; 5) The signs derived from the different phenomenal domains in the world of semiotics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in the synergy and integration of signs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This research can shed some light on the choice of signs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gn.

**Keywords:** multimodal discourse , the meaning of the sign , affordances; semiotic system , meaning potential